

维多利亚时代 与后现代历史想象



拜厄特“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

*A.S. Byatt's Reconstruction
of the Victorian Age in
Angels and Insects*

金冰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维多利亚时代与 后现代历史想象

——拜厄特“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

A. S. Byatt's Reconstruction of the Victorian

Age in Angels and Insects

金 冰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多利亚时代与后现代历史想象:拜厄特“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金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301-17914-7

I. ①维… II. ①金…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英国—现代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5098 号

书 名: 维多利亚时代与后现代历史想象

著作责任者: 金 冰 著

责任编辑: 王 晶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914-7/I·227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180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术基金资助

目 录

引 言	1
-----------	---

绪论：《天使与昆虫》

——一幅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肖像	9
一、《天使与昆虫》研究现状综述	9
二、达尔文主义与唯灵论的交汇	20

第一章 双向占有

——A. S. 拜厄特“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历史想象 与现实观照	27
一、维多利亚文化热与“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兴起	27
二、维多利亚时代特征与后现代历史想象	30
三、拜厄特与后现代历史观的对话	38

第二章 《天使与昆虫》

——A. S. 拜厄特“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达尔文主义 与唯灵论思潮	44
一、拜厄特对达尔文主义的重构	44
二、拜厄特对唯灵论的重构	56
三、拜厄特对丁尼生的重构	68

第三章 《尤金尼亚蝴蝶》：天使还是昆虫？

——一个达尔文主义者的精神成长历程	79
一、威廉与哈罗德：达尔文式悖论	81
二、尤金尼亚与麦蒂：类比和变形	98
三、英国庄园与亚马逊丛林：双重意识与英国性	114

第四章 魂兮归来

——《婚姻天使》对艾米莉与丁尼生的重构	123
一、丁尼生：“物质比精神更神秘”	127
二、艾米莉：“天使在人间”	150
1. 艾米莉·丁尼生与艾米莉·丁尼生：未曾讲述的故事	151
2. 艾米莉·杰斯和亚瑟·哈勒姆：穿越沉重的肉身	162

第五章 通灵术与灵媒

——另外的世界	173
一、莉莉斯·帕佩格：“地球上的玫瑰”	174
二、索菲·施克：灵视者	185

结语 重构背后	193
---------------	-----

引用文献	198
------------	-----

后 记	210
-----------	-----

引 言

英国当代女作家 A. S. 拜厄特继《占有》(*Possession*, 1990)之后又相继创作了《天使与昆虫》(*Angels and Insects*, 1992)、《传记家的故事》(*The Biographer's Tale*, 2000)等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即所谓的“新维多利亚小说”。^① 拜厄特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持续关注引起批评界的注意,一些评论家甚至将拜厄特称作后现代维多利亚人。

在此之前,国外的拜厄特批评大多聚焦于拜厄特作品中现实主义传统与后现代叙述策略之间的结合,亦或其创作中的历史主题及历史化叙述策略,从女性主义视角对拜厄特作品进行解读的评论也占有较大的比重。近年来,随着维多利亚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从历史重构角度对其“新维多利亚小说”展开评述的批评家逐渐增多。弗雷德里克·霍尔姆斯在《历史想象与维多利亚往昔》一文中指出,拜厄特小说中的历史想象与现实关注相互结合,他将《占有》视为“用历史想象再现维多利亚往昔”的文学典范。^② 达

^① “新维多利亚小说” neo-Victorian novels 有时也称作 retro-Victorian novels,是指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描述对象或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故事背景的新历史小说,详细介绍参见本书第 29 页。曾为拜厄特赢得布克奖的成名作《占有》是她创作的第一部“新维多利亚小说”。

^② Frederick. M. Holmes,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the Victorian Past: A. S. Byatt's *Possession*,” *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 20 (1994): 327.

娜·席勒则以《占有》及彼得·艾克罗伊德的《查特顿》为例，论述了“新维多利亚小说”如何在传达一种关于历史文本化的意识的同时，执著于再现维多利亚时代特定的历史文化现实。这些评述大多集中于《占有》一书，对《天使与昆虫》及《传记家的故事》鲜有提及。

国内的拜厄特研究近年也颇为活跃，《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等重要学术期刊先后刊发了数篇高质量论文，分别从女性主义、神话原型及叙事学等多个角度对拜厄特的作品展开评述，如程倩的《历史的回声——拜厄特〈占有〉之多重对话关系》重点阐释拜厄特作品中的历史意识及多重历史表述，在其专著《历史的叙述与叙述的历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程倩从叙事学视角对《占有》的历史性进行了多维分析；徐蕾在《论拜厄特小说〈太阳的影子〉中的父亲形象》等文中则从身体隐喻的角度入手分析拜厄特作品中的身体形象及其互文关系。这些讨论大多聚焦于拜厄特作品的历史叙述策略与创作特色，文本分析则集中于《占有》及《太阳的影子》（1964）和《游戏》（1967）等带有自传色彩的早期小说。

然而，作为拜厄特最具代表性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天使与昆虫》在学术界却遭到意外的冷遇。部分研究者认为，与《占有》不同，拜厄特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过多地受到其学术背景的干扰，学院式的讨论损害了小说自身的趣味性和情节性。在批评界，认为该书内容重复、学究气十足、说教味过浓的观点十分普遍。但也有批评家如凯瑟琳·凯莉等使用“批评小说”（ficticism）的概念为拜厄特辩护。所谓“批评小说”，即以小说形式展开的文学、文化批评。这种小说不以故事取胜，情节发展缓慢，具有较强的互文性特征，作家更加关注的是如何以故事为依托，通过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文学、文化观念。^①事实上，拜厄特作为作家和批评家的双重身

^① Kathleen Coyne Kelly, *A. S. Byatt*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6) 114.

份对其创作的影响很早就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克里斯汀·弗兰肯在《拜厄特：艺术，作家身份，创造性》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拜厄特的学者型作家身份与其小说创作之间的相互关联；国内学者宋艳芳新近发表的《论拜厄特学院派小说的自我指涉特征》一文对“批评小说”的历史沿革作了较为细致全面的梳理和介绍，并重点分析了拜厄特的学术背景对其写作风格的影响。宋文指出，“拜厄特的学者身份一直在介入其创作，使她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自觉意识的写作风格”^①。

尽管作为批评家的拜厄特和作为作家的拜厄特在思想观念上并不总是相互一致，我们也无意使一方沦为另一方的注脚，但鉴于她作品中表现出的深刻的理论、文化自觉意识，以及她对热点学术问题的高度敏感，我们对其作品的讨论显然不能单纯以故事性和趣味性为衡量标准，而应将其置于更大的文化批评语境之中。从这个层面看，《天使与昆虫》在拜厄特的“新维多利亚小说”系列中具有不同寻常的阐释意义。《天使与昆虫》由两部较长的中篇小说《尤金尼亚蝴蝶》（“Morpho Eugenia”）和《婚姻天使》（“The Conjugal Angel”）组成，分别以19世纪60年代早期与70年代中期的英格兰为时代背景，通过分别重构19世纪达尔文主义者和唯灵论^②

^① 宋艳芳，《论拜厄特学院派小说的自我指涉特征》，载《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1期，第96—104页。

^② 唯灵论（spiritualism）在哲学范畴中有时被当作唯心主义的同义词，但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唯灵论词条的定义，“任何一种哲学思想体系，只要它对感觉所难以察觉的非物质的实在的存在予以肯定，就可称之为唯灵论。”按照这样的含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都可被视为唯灵论者。Spiritualism更加觉见的一种解释是在宗教或神学范畴中通过精神与死者交流，《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将之翻译为招魂说，“指相信已故者的灵魂一般借助于灵媒通过物质现象或在世者的昏睡等不正常精神状态与在世者相交的一种信仰，根据这种信仰而进行的作业称为招魂术。”但国内学者一般仍然使用唯灵论的名称用以描述这种通灵理念和实践。1848年，美国纽约州的福克斯姐妹所表演的“显灵”，是现代唯灵派运动的起源。通常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唯灵论并不具备很大的哲学价值，但近年来，唯灵论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含义越来越受到文化批评家的关注。我在本书中所讨论的正是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的这股备受争议的唯灵论思潮以及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招魂术或称通灵术。见《不列颠百科全书》1999年国际中文版唯灵论词条和招魂说词条。

者的故事，从当代视角重新审视维多利亚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景观：即以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思想对传统基督教观念的巨大挑战所带来的信仰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关系的讨论。其中，《婚姻天使》还在通灵故事的框架内重构了19世纪桂冠诗人丁尼生和他的妹妹艾米莉·丁尼生及好友亚瑟·哈勒姆的故事。小说的叙事采用了（维多利亚时代）单一时空结构，《占有》与《传记家的故事》中的当代时空框架不复存在，读者无需经由20世纪人物的视角和中介，而直接面对维多利亚时代那些思考的灵魂，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贴近感及真实感。然而，如凯莉所言，我们又时时都能感受到隐含作者那富于洞见的审视和反思的目光。^① 尽管小说的篇幅不长，但涵盖的内容和思想却极为丰富厚重，小说中所呈现的维多利亚时代文化图景比当代政治、文化话语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建构更为复杂和具体。

在谈及《天使与昆虫》的创作意图及构思过程时，拜厄特曾经说过，“年纪越大，我就越习惯于将自己的生命视作一个漫长故事里一个相对短暂的章节。在这个故事里，达尔文与弗洛伊德——还有丁尼生，甚至斯维登堡——对我来说比电视上的许多内容（我也很感兴趣），甚至比科威特与萨拉热窝的日常新动向都更加重要与急迫”^②。《婚姻天使》源于作者在伦敦大学所做的关于亚瑟·哈勒姆及丁尼生《悼念集》的讲座，《尤金尼亚蝴蝶》则同她对现代达尔文主义思潮和达尔文小说的兴趣有关。拜厄特指出，如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加以讨论，小说的主题可以概括为诸如《亚瑟·哈勒姆，

^① Kathleen Coyne Kelly, *A. S. Byatt* 99.

^② A. S. 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Selected Essay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000) 94.《天使与昆虫》酝酿和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的国际热点新闻便是爆发于1990年的海湾战争以及1992年开始的波黑内战。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艾米莉·丁尼生与艾米莉·丁尼生:男性友谊与维多利亚妇女》;^①或者《维多利亚人想象中的死后生命》;或者《维多利亚人思想中的性选择与昆虫社群》;或者《人间天堂:亚当,林奈,华莱士,贝茨,英国树篱与亚马逊丛林》。^②

正是由于《天使与昆虫》一书所具有的学术性和思辨性特点,批评家们才将其称作“批评小说”。在《天使与昆虫》中,以内文本形式出现的来自《圣经》,斯维登堡,丁尼生,弥尔顿,济慈,哈勒姆,莎士比亚以及各种其他文本的意象、主题和思想交织在一起,形成相互映照、相互作用、相互消解同时又相互阐释的具有张力的文本网络。其中,丁尼生的《悼念集》占据了最大的比重。在《尤金尼亚蝴蝶》中,哈罗德·阿拉巴斯特牧师多次引用丁尼生的诗歌,试图以此证明真正的信仰必将超越怀疑与绝望,因为在他看来,一种真正的源自上帝的引导使丁尼生摆脱了绝望和疑虑;但拜厄特则在小说中揭示了哈罗德对丁尼生诗歌解读的局限,甚至误读。而在《婚姻天使》的叙述中,更是时时萦绕着《悼念集》的声音。

事实上,作为一名学者型作家,拜厄特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还发表了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对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勃朗宁、丁尼生和乔治·爱略特等她所喜爱的19世纪诗人和作家的评述。同时,她对自己的创作思路和过程、自己小说中的意象和主题也多有评述,对她的批评思想和创作理念有所了解无疑会加强我们对其作品深层含义的理解和体会。因此,在第一章中,我将以拜厄特最重要的两部批评文集《心灵的激情》(*Passions of the Mind*, 1991)和《论历史与故事》(*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2000)为依据,总体论述拜厄特对维多利亚时代特征的

① 分别指丁尼生的妹妹和妻子。丁尼生的妻子艾米莉·塞尔伍德(Emily Sellwood)婚后随夫姓即为艾米莉·丁尼生。

② 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92.

理解以及她与后现代历史观之间的对话，这一章中还包括“新维多利亚小说”兴起的文化背景介绍。

第二章中，我将从主题建构角度分别论述拜厄特在《尤金尼亚蝴蝶》中对达尔文主义的重构与吉莲·比尔所界定的“达尔文式悖论”之间的关系；在《婚姻天使》中对灵媒和唯灵论的重构与亚历克斯·欧文关于女性灵媒“权力悖论”理论的关系；以及在《婚姻天使》中对丁尼生的重构与现代派诗歌反维多利亚立场之间的关系。

从第三章开始，我将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对第二章中所提及的“三重”重构展开详细论述。第三章主要聚焦于《尤金尼亚蝴蝶》中信奉达尔文主义的青年科学家威廉·亚当森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达尔文式悖论”，即对自然神学人格化思维和神学类比的否定与自身人格化和自我同构倾向之间的矛盾，重点分析威廉如何通过对人与昆虫之间复杂类比关系的辩证思考，不断纠正自身达尔文式的认识偏差和态度偏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本能即命运”的生物决定论思想，并在麦蒂的帮助下凭借自身努力证明了人不是蚂蚁。《尤金尼亚蝴蝶》与一般当代达尔文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延续了关于偶然还是设计、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达尔文式命题的讨论，还通过对一个达尔文主义者精神成长和转变的描写，还原了研究主体作为具体的人所特有的情感意志和历史、文化价值取向，从而为传统维多利亚小说中科学与宗教冲突的主题赋予了新的意义。

第四章论述拜厄特在《婚姻天使》中对丁尼生和艾米莉的重构。丁尼生部分我将首先比较拜厄特笔下的丁尼生与史料记载中的丁尼生之间的异同，然后重点分析拜厄特对《悼念集》中各种与“手”和“触摸”有关的意象以及丁尼生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物质性焦虑的解读，并将拜厄特的文学化解读与克里斯托弗·克拉夫特、安吉拉·莱顿等诗评家的学术化解读进行比较，凸显出拜厄特对

丁尼生诗歌的感性特征及其语言物质性的关注,尤其是卢克莱修式物质性生命观对丁尼生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拜厄特对现代派诗评家反维多利亚立场的回应。艾米莉部分我将首先分析拜厄特如何从女性主义视角重构《悼念集》中有意隐略的艾米莉·丁尼生的故事,并通过互文性解读揭示出艾米莉的遭遇所具有的代表性意义。然后,我将进一步分析艾米莉对哈勒姆的回忆和悲悼所呈现出的具相化、物质化及感性化的特点,以及她在降神会上与哈勒姆亡灵进行交流时所表现出来的物质性焦虑。尤为重要的是,我将通过对哈勒姆“显灵”场景的分析,揭示拜厄特对肉身性和生命物质性的关注以及她对于此世,欲望,和情感的另一种思路。

第五章主要讨论拜厄特对 19 世纪灵媒和通灵术的重构。我将分别论述具有艺术家品格的灵媒帕佩格夫人和作为“灵视者”(visionary)的灵媒索菲在参加降神会的过程中如何越来越趋向于肯定自身的精神、情感诉求以及自我主体意志,从而颠覆了欧文的悖论说。同时,我还将阐述帕佩格夫人和索菲在通灵体验中对生命物质性的感悟,从而与丁尼生和艾米莉部分的论述相互呼应。

结论部分主要分析两篇小说主题上的对应性与作家本人历史观,自我观和文化观之间的联系。

上文所提及的学者对于“批评小说”及“学院派小说”的讨论对我们更好地理解拜厄特的作品无疑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但与其不同的是,我重点关注的并非“批评小说”或者“学院派小说”自身的文本特征抑或拜厄特批评立场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和悖论,本书着眼于《天使与昆虫》所具有的“批评小说”特色,从拜厄特对 19 世纪达尔文主义和唯灵论、以及唯灵论背景下的丁尼生故事的重构入手,着重分析拜厄特如何以小说的形式与当代维多利亚文化批评家展开对话,她的重构在哪些方面受到当代文化批评话语的

影响,又在什么意义上对其进行了颠覆。

论述中涉及到的主要批评家包括当代科学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剑桥大学教授吉莲·比尔(Gillian Beer);哈佛大学女性研究学教授亚历克斯·欧文(Alex Owen),她在1988年出版的《被遮黑的屋子: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国的女性,权利与招魂术》是有关维多利亚时代唯灵论研究的权威著作;T. S. 艾略特等现代派诗学的代表人物以及安吉拉·莱顿(Angela Leighton)等19世纪诗歌研究专家。

绪论:《天使与昆虫》

——一幅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肖像

一、《天使与昆虫》研究现状综述

《天使与昆虫》出版后在评论界引起的反响远不及《占有》热烈,有关《天使与昆虫》的评论十分稀少,只有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的零星文章,且大多只是围绕其中一篇小说、尤其是《尤金尼亚蝴蝶》展开论述。^①

《尤金尼亚蝴蝶》是一部具有哥特寓言特征的思想小说(novel of ideas),其主题涉及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然神论,两性观念及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性选择、近亲繁衍等多方面内容。故事开始于1861年,此时距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已有两年之久。主人公威廉·亚当森(William Adamson)是以19世纪博物学家阿尔弗莱

^① 部分原因在于1995年菲利普·哈艾斯(Philip Haas)将《尤金尼亚蝴蝶》改编后搬上了银幕,但影片名字依然为《天使与昆虫》。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目前国内对《天使与昆虫》的系统研究尚为空白,蒋显文在引进版《占有》的前言中曾对该书有寥寥数行的介绍。参见《占有》,〔英〕A. S. 拜厄特,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2页。

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 1823—1913)及他的朋友、生物学家亨利·贝茨(Henry Bates, 1825—1892)为原型的一名博物学家和科学探险者。^①他在亚马逊丛林中生活了10年,采集动植物标本,考察生物的形态和地理分布,但在返回英国的途中遭遇船难致使大部分标本葬身海底。于是他接受了贵族出身、信奉自然神论的国教牧师阿拉巴斯特(Harald Alabaster)的邀请,暂住在布莱德利庄园,帮助牧师整理他从世界各地购买搜罗的珍奇标本,并对它们进行分类。威廉被牧师的大女儿尤金尼亚(Eugenia Alabaster)所吸引,并惊喜地发现尤金尼亚与自己在南美丛林中发现的一种珍稀蝴蝶(Morpho Eugenia)有着同样的名字。他对尤金尼亚的爱慕和追求得到了她本人的回应和阿拉巴斯特牧师的支持。全家人中只有尤金尼亚同父异母的长兄埃德加(Edgar Alabaster)对此表示反对,他自恃血统高贵,对出身卑微的威廉极尽嘲讽挖苦并多次进行挑衅。尽管如此,社会地位悬殊的威廉和尤金尼亚最终还是顺利地结婚生子。与此同时,威廉发现,在这座富丽堂皇的贵族邸宅中还隐藏着另一个不为人注意的仆人的世界,他们象辛劳的工蚁一般维持着这座大厦的日常运转。格外引起他注意的是一位寄居在牧师家的简·爱式的家庭女教师——麦蒂·柯罗姆敦(Matty Crompton)。她受过良好的教育,热爱自然并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在她的鼓励下,威廉恢复了对于科学观察及写作的热情,并最终创作完成了一部关于蚂蚁群落生活的博物学著作。而麦蒂也创作了一部寓意丰富的动物寓言,暗示了威廉雄蚁般的生活境遇。在一次看似偶然的情形下,威廉发现了妻子与她哥哥埃德加之间存在已久的乱伦关系。早就渴望重归大自然的威廉终于决定离开这种腐朽,凝滞,令人窒息的贵族生活,重回亚马逊丛林。小说结

^① 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79.

尾,威廉带着对人性与自然的新认识,与麦蒂一起在一个名叫阿图罗·帕佩格(Arturo Papagay)的船长的帮助下,踏上了通往巴西进行科学考察的新航程。

萨莉·沙特尔沃斯认为,《尤金尼亚蝴蝶》是双重意义上的自然史书写,它不但以嵌入文本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书中人物威廉与麦蒂所创作的有关蚂蚁的自然史著作,而且小说自身的文本形式与叙述活动也具有一种“自然史”的特征,因为“它以一种令人眩晕的细节感”不断向主人公的生活与思想的深处移动,使他们仿佛“被置于放大镜的审视之下”^①,呈现出不断变化的复杂形态,而自然史所要歌颂的正是由难以计数且形态各异的细小事物所组成的生机勃勃的世界。沙特尔沃斯借用 G. H. 刘易斯的话称这部作品为“在每一寸土壤,每一滴水珠中不断上演的伟大戏剧”。^②

朱迪丝·弗莱切将《尤金尼亚蝴蝶》视为一部变形版的《奥德赛》。^③ 她认为,小说开始时的家庭舞会场景与结尾处威廉和麦蒂海上远航的场景形成对照,表现了小说寻找精神家园的主题。她指出,不但麦蒂创作的童话中多次提及《奥德赛》中的人物,如女神喀尔刻、水手埃尔佩诺尔等,而且威廉与麦蒂搭乘的船只也以女神卡吕普索(Calypso)的名字命名。在希腊神话中,海上女神卡吕普索因为爱上英雄奥德修斯而用魔力将他留在自己的小岛整整七年。奥德修斯在返回故乡的途中所经历的艰险历程,作为一种总体性隐喻,成为所有寻找叙述(quest narrative)的神话原型。当然,奥德修斯漂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返回故乡伊萨卡岛与妻子珀涅罗珀团聚。在 10 年漂泊之后,奥德修斯重新承担起父亲和丈夫的社

①② Sally Shuttleworth, “Writing Natural History: ‘Morpho Eugenia,’” eds. Alexa Alfer and Michael J. Noble, *Essays on the Fiction of A. S. Byatt* (London: Greenwood, 2001) 150.

③ Judith Fletcher, “The Odyssey Rewoven: A. S. Byatt’s *Angels and Insects*,” *Classical and Modern Literature* 19 (1999): 217–31.